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

大眾書店印行

潘開沛著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

潘開沛 著

大東書莊印行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

书号：京 277 (发)

32K. 116P. 4900 元

大众书店印行

北京西四北大街

有版权·不准翻印

北京合作印刷厂承印

北京长城印刷厂承印

初版：1952年3月

(0001—5900)

前 言

在討論武訓問題中，使我們認識了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以宋景詩爲代表的革命道路和武訓的封建奴才道路的區別，認識了武訓的醜惡的卑劣的可恥的面貌，澄清了文化教育界一些混亂的思想。

由討論武訓問題曾牽涉到了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問題，但是對於陶先生的教育思想的批判工作，卻還正在「人民教育」月刊上展開着，現在還沒有作出結論。

爲了認清革命道路和改良主義道路的區別，爲了認清新民主主義教育思想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區別，爲了掃除新民主主義教育建設中的障礙，而來專門研究、批判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確是很有必要的。作者想趁着大家討論的時候，提供一些參考的資料，所以寫下了這本小冊子。作者是盡可能地想從陶先生教育事業的發展過程中，而不是某一階段，想從生活教育的基本理論，而不是個別主張和詞句，來全面地分析他的教育思想，以便認清陶先生的教育思想的本質，以便劃清教育思想上的界線。

但是，作者的理論修養和對於毛澤東思想的學習，仍然是很不夠的，不正確的地方一定不少，所以希望讀者多多提供意見，等到討論的總結作出後，便可以在再版中來修正或補充。

這本小冊子，曾經得到過許多同志的指示和幫助，在此謹致謝意。

作者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八日夜在北京

目 錄

前言·····	一
一 革命道路與改良主義道路·····	一
二 從發展過程來看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四
三 生活教育理論的批判·····	五〇
(一) 「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	五〇
(二) 「教學做合一」·····	六七
四 劃清思想界線·····	八一
附錄·····	九〇

一 革命道路與改良主義道路

在「五四」運動前後，對於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出現了兩種不同的主張和道路。

革命的
道路

一條道路，就是革命的道路，馬列主義者——共產黨、毛主席所指出的道路；認定中國的貧弱而落後，乃是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地主、軍閥、官僚資產階級之剝削壓迫中國人民；中國人民要解放，就必須要打倒這些敵人，推翻反革命的統治，進行土地改革，建立人民的政權；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有一個堅強的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在中國工人階級的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組織統一戰線，團結一切革命的同盟者，組織人民武裝，進行武裝鬭爭。

三十年來，毛主席、中國共產黨領導着中國人民走上了這條徹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唯一正確的勝利的道路，與國內外反革命勢力進行了嚴重的武裝鬭爭，以致推翻了國內反革命的統治，驅逐了外國帝國主義的勢力，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另一條道路，就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道路。這些改良主義者，認爲中

改良主義的道路

國之所以貧弱落後，乃是由於內部紛爭，文化不普及，科學不發達，人民愚昧自私（？）；他們認爲在反動統治基礎上，只要作出某些政治上的改良，便可調和階級鬭爭，便可使中國強盛。其中又有所謂教育救國論者，他們認爲只要普及教育和科學，用文質彬彬的教育方法，便可以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幻想在兩大敵對陣營的武裝鬭爭的夾縫中，躲在城市或鄉村的一角，找出一條既不流血又能「成功」的和平坦途。他們高舉教育救國和科學救國的旗子，高唱普及教育的調子；在旗子上標榜着各種不同的旗號，如平民教育、鄉村教育、職業教育、科學教育、生活教育，各說各的好，各說各的主張是救國救民的「唯一正確」的道路。但隨着中國的民族危機和階級矛盾的發展，在新民主主義大革命的進程中，所謂改良主義者的第三條道路，是徹底地破產了，於是他們中有的就轉向於革命陣營，跟着共產黨走了，有的就退休了，消失了他們的踪影，有的就完全走到國民黨反動派那邊去了，顯露了他們真實的反動面貌。

改良主義者標榜着「爲國家」、「爲人民」的超階級超政治的口號，自稱爲第三者，而實際上是爲資產階級政治經濟服務的，是直接或間接反對革命路線的；他們的思想是反動的，是唯心論的。

在教育救國論者中，陶行知先生便是其中的一個；他直至晚年才由改良主義者逐漸變

爲愛國的民主主義者。他從事教育工作三十年，他的教育學說，在中國傳播了將近二十年（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六年），在教育界的影響是不小的。到底他的教育學說是無產階級的教育思想，還是資產階級的教育思想？是辯證唯物論的，還是唯心論的？是革命的教育學說，還是改良主義的教育學說？是與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相符合的，還是相違背的？我們今天應該怎樣對待他的學說？諸如此類的問題，是有研究的必要了。

二 從發展過程來看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五四」
前後

陶先生十五歲（一九〇六年）便入耶蘇堂內地會所設立的崇一學堂肄業，十九歲（一九一〇年）入南京金陵大學文學系肄業，二十三歲（一九一四年）去美留學，二十五歲（一九一六年）回國。由於接受了歐美的舊民主主義思想和杜威的實驗主義教育，所以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教時便傳播了這一套資產階級的教育思想。

「五四」運動前後，正是中國資本主義有了新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抬頭，無產階級也有了新的發展的時候，人們都在尋求中國社會的出路。馬列主義和各種學說，如杜威的實驗主義等同時在中國傳播着，鬭爭着。

「五四」運動提出了民主與科學，反封建專制和武斷迷信，反老八股，反帝國主義等等。這時陶先生的注意力正放在教學方法的改造方面，據他自己說：「繼而五四事起，南京高等師範同事無暇堅持，我就把全部課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爲教學法。」（見「生活教育論

「集」的「教學做合一」從教學法的改革開始，他進一步地想要改革中國的教育，因此在一九二一年組織了中華教育改進社，並在「新教育」雜誌上發表改進教育的論文。

陶先生開始從資產階級的實驗主義的立場，來反對其他資產階級的教育學說和洋八股。如蒐集在「中國教育改造」一書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提倡試驗主義，反對傳統教育的，如他說：「全國學者，苟能盡刷其依賴天工，沿襲舊法，儀型外國，率任己意，偶爾嘗試之舊習，一致以試驗為主，則施之教育而教育新，施之萬事而萬事新，未始非新國新民之大計也。」（見該書「試驗主義與新教育」）這是陶先生提倡資產階級教育必須中國化的開始。

同時他又提倡「生利主義之職業教育」，如果全國推行了這種職業教育，那麼「將見國無游民，民無廢才，羣需可濟，個性可舒；然後輔以相當分利之法，則富可均而民自足矣」（見該書「生利主義之職業教育」）。這不是別的，正是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思想，反映在教育方面的實用主義。

前者是教育的方法，後者是教育的內容；這兩種主張，正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正是合乎當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要求的。因為要發展資本主義，就需要用試驗主義的方法和實用主義的內容來訓練資本主義生產的後備軍，並使之中國化，而便於推行。

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中國，是處在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中（一九二一年中國共

平 民
教 育

產黨成立，一九二五——二七年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由於陶先生當時是站在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立場，所以他遠離了這個偉大的歷史巨變，而響應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所倡導的平民教育（歐美資產階級騙人的把戲），並在江蘇當局的贊助下首先在南京組織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一九二三年在南京成立），以及同年八月在北京參加該會總會的成立。認為「中國政治雖不統一，但教育是統一的。我們深信統一的教育可以促成統一的國家。」「中國現在所推行的平民教育是一個平民讀書運動。……都市裏提倡平民教育，一大半要靠商界。漢口各商團聯合會周會長尤其熱心，他手創的幾個平民學校都很有成績。……工廠主人提倡此事最有力的有武昌李紫雲先生，我們希望全國的工廠繼起提倡工人的平民教育……」（見一九二四年十月號「中華教育界」的「平民教育概論」）陶先生自己親手編「平民千字課」和往各省推行平民教育。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陶先生一方面是教育救國論者，另一方面是要盡力使教育為工商業資本家服務，和依靠工商業資本家。平民教育並不是真正為廣大市民（店員）和工人服務的，而是為發展資本主義服務的，為民族資產階級服務的。有的人認為陶先生提倡平民教育是從大眾的立場出發，為人民大眾服務，是根本錯誤的。

鄉村教育在五四運動時期，就已成爲教育界討論的題目了；這個問題的提出，也是受

鄉村教育

了美國、丹麥的鄉村教育的影響。當時一些沒有被統治階級重視而失意的美國留學生，就由對一般教育的改造和提倡教育機會均等，進而轉到鄉村教育的宣傳方面。到了一九二六年，便逐漸由討論階段而進入實踐階段，由城市的平民教育而轉入鄉村教育。

一九二七年，國民黨蔣介石叛變了革命，發動了血腥的「四一二」大屠殺，民族資產階級隨着反革命走了，共產黨則單獨領導中國人民繼續進行反帝、反封建、反國民黨統治的鬪爭。革命的主力從城市深入到農村，團結農民進行土地改革，武裝農民進行武裝鬪爭。

陶先生則仍然站在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立場，想在革命與反革命的武裝鬪爭中找到一條中間的出路，他也把眼睛從城市轉向鄉村，放棄了平民教育的口號，想進一步普及廣大鄉村教育，企圖以鄉村教育來改造中國社會。

7.
陶先生寫的「中華教育改進社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書」中說：「本社的鄉村教育政策是要鄉村學校做改造鄉村生活的中心；鄉村教師做改造鄉村生活的靈魂。……今後主要使命之一即在勵行鄉村教育政策爲我們三萬萬四千萬農民服務。我們已經下了決心要籌募一百萬元基金，徵集一百萬位同志，提倡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同上書）在「中國鄉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中，以同樣的精神說道：「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

他教人離開鄉下向城裏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務須把馬勒住，另找生路！」生路是什麼呢？陶先生回答說：「就是建設適合鄉村實際生活的活教育！我們要從鄉村實際生活產生活的中心學校；從活的中心學校產生活的鄉村師範；從活的鄉村師範產生活的教師；從活的教師產生活的學生，活的國民。……活的鄉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長五穀。他要教農民自立，自治，自衛。他要叫鄉村變為西天樂園，村民都變為快樂的活神仙。……總之鄉村學校，是今日中國改造鄉村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我們的新使命，是要徵集一百萬個同志，創設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叫中國一個個的鄉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來造成中華民國的偉大的新生命。」（同上）一句話，就是要以鄉村教育來拯救中國。絲毫不觸及帝國主義、反動統治和生產關係，這就是十足的教育救國論的主張！

曉莊試驗學校

在這種主張之下，他自己首先以實驗主義的精神來從事試驗，想做一個榜樣，以便推行全國。所以，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在南京城外的一角創辦了南京市試驗鄉村師範學校（後簡稱爲曉莊學校），進一步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等主張，這就是陶先生建立自己的教育學說的開始。

曉莊教育的真相是什麼？陶先生說「是從野人生活出發，向極樂世界探尋」。什麼是

野人生活？就是當時的農民生活。「封建制度下之農民生活是最不進步的。他們一天天的過去，好像人生毫無問題。」（同上「從野人生活出發」）什麼是文明人呢？「文明人與野蠻人的最大分別就是文明人能把這些非身體的工具發明得格外多，製造得格外精巧，運用得格外普遍。」所以「真正的生活教育必以生活工具爲出發點」。「只有發明工具，製造工具，運用工具是真教育，是真生活。」（見該書「生活工具主義之教育」）在「曉莊三歲敬告同志書」中又說「曉莊是從愛裏產生出來的，沒有愛便沒有曉莊。因爲他愛人類，所以他愛人類中最多數最不幸之中華民族，因爲他愛中華民族，所以他愛中華民族中最多數而最不幸之農人。他愛農人只從農人出發，從最多數最不幸的出發……」（同上）。

陶先生是轉向於農村和農民了，可是由於他以資產階級的眼光來看農民，所以中國農民便成了他眼睛中的野人。他看到了中國農民的不幸，但他看不見貧僱農不幸的根源和最迫切的要求——土地問題。

怎樣才能改變這種「野人」生活的狀況呢？陶先生認爲：只有給農民一些文化科學知識，改良生產工具，使他們提高生產技能和生產量，至於這些生產品是不是農民自己可以享受而不被地主以地租的方式剝奪去，或者不被封建、買辦、法西斯的反動統治以各種捐稅的名義剝奪去，陶先生是看不見的和不能理解的。

陶先生雖口口聲聲說是愛人類、愛農民，要從農民出發，但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就只能從資產階級出發，而不能真正從農民出發；就只能抓住農民的雞毛蒜皮的問題，而不能解決農民的根本問題。這和一切資產階級人物所講的「全民政治」、教育機會均等、「全民教育」等等是一樣的虛偽。不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一切爲農民、爲人民、爲人類的漂亮詞句都是廢話。只有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才能真正做到愛農民、愛人類；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農民才能得到土地，才能解除農民痛苦的根本原因，才能提高生產量，才能使農業國轉爲工業國。

到底什麼是極樂世界呢？把農民帶到哪個極樂世界裏去呢？陶先生是說不出所以然的。他不相信共產主義，他的眼睛沒有朝向十月革命後的蘇聯，他所熟習的只是美國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於是他只能處在「探尋」極樂世界的階段，實際上可以說就是美國式的「極樂世界」，把農民帶到資本主義的文明中去。可是到了一九三〇年夏天，蔣介石反動政府，便連這樣的自由主義的探尋者和這樣的改良主義的曉莊學校也不允許存在了，連他們做教練用的幾十枝破槍都被繳了械，一塊小小的根據地便被人霸佔了。當然，這不是因爲陶先生革命，而只是因爲曉莊有共產黨員在那裏進行革命工作。

這時（一九三一年）他便不能不退到上海去。但他還不能覺悟到教育救國是一條死

自然學園

路；鄉村教育是收起了，在民族資本家的幫助下，他創辦了自然學園，從事於科學普及工作。提出「科學下嫁」給兒童和大眾的口號。認為科學教育之普及又可以救國。不幸「九一八」、「一二八」的砲火打響了，日寇開始了新的進攻，而反革命的內戰繼續進行着。在這樣內外鬪爭交叉着的時候，由鄉村教育後退到什麼通俗化的科學，對於處在痛苦深淵裏的人民大眾，真是隔靴抓癢啊！

工學園

民族危機促使着陶先生不能不感覺在房子裏搞通俗化的科學叢書沒有什麼成效，但他仍然醉心於他的普及教育，於是在頭腦裏製造了一個「工學園」的新名詞，又一次地自以為抓住了解決人民大眾的痛苦的鎖鑰，解除民族危機的救命圈。

什麼是工學園呢？陶先生說：「工學園是一個小學校，但同時是一個小工場，又是一個小社會。學校的主要意義是長進，工場的主要意義是生產，社會的主要意義是平等互助，自衛衛人。」（見「生活教育論集」的「工學園」一文）在另一篇文章裏又說：「工是做工；學是科學；園是集團。牠的目的是『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園以保生』。」（同上「普及大眾的教育」）「說得更清楚些是：以大眾的工作養活大眾的生命；以大眾的科學明瞭大眾的生命；以大眾的團體的力量保護大眾的生命。」（見「普及什麼教育」）